

“两课”异识初探

吴崇恕

(孝感学院,湖北 孝感 432100)

摘要:“两课”是教育部明文规定的大学公共必修课,“两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不少大学生却并不完全这样认为,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认识差异即“异识”是客观存在的。应对这种“异识”的普遍性、产生原因、危害以及解决的途径与方法进行必要的探讨。

关键词:“两课”;“异识”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2)04-0127-03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简称“两课”)作为教育部明文规定的大学生公共必修课,在各高校已开设多年。总的说来,开课的情况逐渐好转,教学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两课”的效果也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教育主管部门、高校各级领导及广大教师对“两课”的重要性、必要性已形成共识。然而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在“两课”的教学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不少大学生并不完全认可“两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不能形成共识,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异识”是不能回避的。

一 “异识”的普遍性

这里所说的“异识”是指在“两课”教学中教育者(指称职的)与被教育者在对待“两课”的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上存在的差异。

称职的“两课”教师,都认为在大学开设“两课”是非常重要的,是完全必要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明确指出:“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接班人。现在和今后二十年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如何,直接

关系到 21 世纪中国的面貌,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否实现,关系到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100 年不动摇。”因此,高等学校不仅要让学生接受专业知识与科学思维方法的严格训练,而且还要通过对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行为规范、心理素质的严格训练,培养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健康的心理情趣。后者属于德育的范畴,而“两课”作为德育的主渠道,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都包含着德育,并通过德育把反映特定生产关系的政治信念、思想意识和道德规范内化为受教育者的政治信仰、思想观念和道德品质。我国高等教育也不例外。高等学校通过把反映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的立场观点、行为规范灌输到学生的头脑中,以确保高校培养的学生具有符合跨世纪要求的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因此,在高校认真开好“两课”是高校培养目标的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也是大学生成才的需要。

但是在被教育者看来,“两课”的重要性、必要性与教育者的认识之间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部分学生认为小学、中学都学过道德、政治,学了也没有

收稿日期:2001-12-06

作者简介:吴崇恕(1946—),男,湖北省武汉市人,孝感学院院长,研究员。

什么作用,大学阶段的学习时间紧、任务重,要学的专业知识很多,应集中精力把专业知识学好,开设这么多的“两课”内容,觉得没什么必要。还有不少学生虽然不想学,但不学不行,为了学分,为了毕业证,抱着无所谓、无可奈何的想法走进“两课”教室。于是逃课的大有人在,心猿意马者亦有之。教师在讲台上讲“两课”,学生在下面看英语、做教学作业;教师上课振振有词,学生在下面昏昏欲睡。

二 异识产生的原因及危害

产生异识的原因是复杂的,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原因。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开展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通过批判,拨乱反正,肃清了流毒,清除了影响,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新局面。但是,由于在政治与业务、红与专、德育与智育等关系上的矫枉过正的影响,使重业务轻政治、重智育轻德育的倾向有所抬头,从一个极端开始走到另一个极端。“过去许多学校对‘德’强调得不够,总认为‘德’的标准比较抽象,有的甚至认为‘德’是虚的,是软指标。”[1]有的学生认为“学好计算机、英语、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有了博士研究生文凭走到哪里都能行”。

二是教育原因。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不少学校按成绩排队,按成绩分类,把成绩好的分到“好班”,把成绩差的分到“差班”,把成绩好的学生称为好学生,把成绩差的学生称为差生,似乎好生差生只有一个标准——学习成绩。高考的指挥棒对学校教育和学生的思想、行为的影响也不能低估。很多学校以高考为中心,高考要考的科目就重视,不考的科目就不重视,有的学校高中理科学生因为高考不考政治,而不开政治课,文科学生因为要考政治才不得不开政治课,教师教学和学生学政治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而是为了应付高考。有些地方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把升学率作为考核学校工作的唯一标准,有的学校将各班的升学率作为考核班主任及任课教师工作的唯一标准,并且与教师的奖金、职称晋升挂勾,学校教育中的智育不断强化,德育不断弱化。有的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对于高考过线的凡不是团员的“送”一个团员,整个“入团”手续由学校代办,有的学校通知了本人,有的则忘了通知本人,以至到了大学后,学生档案上记载学生是团员,而学生本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团员。

为了提高升学率,有的冒名顶替,有的偷梁换柱,有的弄虚作假。在他们眼里,什么政治素质、思想觉悟、道德品质都微不足道,只有智育、考分、成绩才是学生的命根。

三是家庭原因。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又是终身教师,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毋庸置疑,当代中国家长是世界上最有责任心、最关心和爱护子女的家长,他们能为子女作出一切牺牲而毫无怨言,他们对子女的爱可谓是殚精竭虑。但中国妇女联合会的一项问卷调查却显示,几乎所有的中小学生在埋怨家长只关心他们的学习成绩,让他们感到学习的压力很大。教育学家尖锐地指出,如今我国的家庭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畸性的教育。孩子与家长相处时的话题只有一个——考试成绩。家长给予孩子的心理暗示即孩子生命的最大目标是考上重点大学。有的家长为了实现这一奋斗目标,不让孩子看电影、看电视、看小说,不让孩子做家务,有的甚至叮嘱孩子不要当学生干部,不要参加社会活动,以免耽误学习。作为家长,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教育子女是不全面的,这种畸性家教会导致学生的畸性发展。

由于“异识”的存在,使大学生与“两课”之间形成了一层天然的“隔膜”,使提高教学质量的难度加大。当他们还未涉足“两课”内容时,就对“两课”产生了偏见,认为是负担,是多余的,即使上“两课”也是迫于无奈。在上“两课”之前就与“两课”没“感情”,准备“混课”、“逃课”或利用“两课”的时间做“私活”。显然,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两课”教学,要想提高“两课”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由于“异识”的存在,使学生不想学的情绪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教师教学的积极性。教师教学水平的下降又导致学生更加厌学,久而久之,就陷入了学生不想学、教师不想教的怪圈。这个问题若不很好解决,将难以完成教学大纲提出的要求,难以实现“两课”的教学目的,对我们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极为不利,应该引起高校教育工作者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三 解决“异识”的途径与方法

首先,要做到全社会都来关心青少年的成长。毛泽东同志说:“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

该管,学校的校长更应该管。”[2](780页)要宣传正确的人才成长观和全面的人才观,要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德育与智育、红与专的关系,要给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造就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和宽松的育人环境,要大力宣传和认真贯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和中央颁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一切思想文化阵地,一切精神文化产品,都要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也要有利于孩子的全面成长。

其次,要大力提倡素质教育,改变用升学率衡量学校、教师工作好坏的做法,改变用分数来评判学生的方法。要改革高考的选人方法,学校教育要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把德育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使学生真正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

再次,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既不能把责任推给社会,也不能把责任推给基础教育,应从战略的高度、历史的高度认清自己的神圣使命。要使大学生在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大学阶段受到良好的教育,开好“两课”,使“两课”真正

成为受学生欢迎的公共基础课。邓小平同志说:“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3](108页)事实证明,教师的“两课”教学水平对解决“异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名好的“两课”教师,可通过自己的教学过程转变学生的思想,改变学生对德育课的偏见,因而能解决“异识”或减少“异识”,最后与受教育者形成共识,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与此相反,一名不称职的“两课”教师,带着不愿教的情绪从事教学工作,他的“功底”达不到,他的感情、精力投入不足,其教学效果肯定不好。这样的教师不仅不能改变或减少学生所原有的“异识”,反而强化或扩大了这种差异。因此,教师的教学过程既能解决学生的“异识”,也可扩大学生的“异识”,由此可见,“两课”教师是能否解决“异识”的关键。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希望广大教师在政治上、业务上不断提高,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3](110页)作为一名“两课”教师应充分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不断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做一名合格的称职的“两课”教师,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异识”变成“共识”。

参考文献:

- [1]吴崇恕.高等学校应当成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坚强阵地[J].孝感师专学报,1987,(1).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Approach to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Two Courses”

WU Chong-shu

(Xiaogan College, Xiaogan, Hubei 432100, China)

Abstract: The “two courses” are common compulsory courses stipulated by Education Ministry for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and their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is self-evident. However, there exists understanding difference between educators and students. It is necessary to discuss the universality, causes, harm and solution of the difference.

Key words: “two courses”;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责任编辑:王永政]